您是否有过纯粹的柏拉图式恋爱，没有性爱的恋爱？

她叫西尔瓦娜，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。1980年，我们在巴厘岛北海岸的*旅舍*相遇。旅舍是为预算有限的旅行者提供的简易住所。我们的旅舍有狭小的房间，里面有一张窄窄的床和墙上钉着几根钉子用来挂衣服，还有一个带桌椅的小茅草屋顶露台，以及一个齐膝高的水盆，旁边有一个地板上的洞，男孩每天早上从外面把水灌进来，供上完厕所后清洗个人卫生之用。那时，只有巴厘岛南部首府登巴萨的大型旅游酒店才有卫生纸。我们这些背包客用左手在脸盆里洗手，就像贫穷国家的人们现在仍然做的那样。这就是为什么左手被称为“不洁”之手，吃饭时必须藏到桌子下面。

我和席尔瓦娜住在相邻的房间，共用一个露台，因此我们自然地聊了起来。她来自巴黎，和朋友一起搭便车从雅加达到了巴厘岛，也就是说从爪哇岛的一端到了另一端，全程约1100公里。我旅行的方式要舒适一些，就是坐火车：“三等卧铺”——三张硬木床，可以像双层床一样折叠起来，尽管旅途颠簸，但你可以铺开睡袋，努力睡一会儿，毕竟这趟旅程持续了三天。

席尔瓦娜告诉我，她当时正和一个朋友一起旅行，但几天前就离开了。她说：“和一个男的。”也许她的语气应该能让我知道他们关系的性质，但我只关注这个有着一头黑色长发和雀斑的苗条女孩，她俏皮的小翘鼻。

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星期，一起旅行，在小村庄里吃沙爹串和木瓜，听嘈杂的加麦兰音乐，这是印度教寺庙节日的一部分（巴厘岛是[印度](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Indien)、[尼泊尔](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Nepal)和[毛里求斯](https://de.wikipedia.org/wiki/Mauritius)以外唯一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地区），去了喧闹的登巴萨市， 但立即掉头逃回我们的露营地，那里除了我们几个背包客，只有总是挂着微笑的迷人当地人。我们乘坐无处不在的三轮摩托（tuk-tuk）前往最近的瀑布，在那里洗了个清爽的淋浴。我永远忘不了席尔瓦的形象，她纤细的裸体被飞溅的水花遮住一半，用世界上最自然的动作给自己涂肥皂，洗头，然后来到我们的营地，用从洛姆斯借来的毛巾擦干身体，躺在树荫下睡着了。

当然，整个过程也充满了情欲，我并不总是能抑制住自己日益增长的感情，当然，Silvaine也注意到了这一点。 与此同时，她告诉我她是同性恋，和她一起去巴厘岛并离开的那个年轻女士是她的爱人。 而且很明显，她对男人不感兴趣。但席尔瓦娜不仅是个漂亮的姑娘，还是个聪明又善解人意的姑娘。一天晚上，在睡前露台上喝啤酒时，她对我说：“蒂姆，我知道我长什么样，也知道你想和我上床。我也不介意。如果你在和我做爱时让我看书，你只要对我好一点就行了……”

一桶冰水同样有效。无论如何，从那一刻起，我有了更好的自我控制能力，我们继续像以前一样生活，即坦率、自由，而且基本上是赤裸的，就像上帝创造我们时那样。在这种高温下，其他任何事情都毫无意义。

但我们天堂般的日子即将结束。我不得不慢慢回到寒冷的欧洲，而Silvaine想去泰国的苏梅岛重新开始生活。唯一的问题是她该如何到达那里。女友不仅跟那个男人私奔了，还卷走了旅行预算：Silvaine身上只有几卢比，只够付房费，仅此而已。

而我则相对富裕：我随身带着几千美元的旅行支票，靴子里还总是揣着一张百元大钞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于是我们坐渡轮（巴厘岛是一个岛屿）前往大陆，然后坐火车从外南梦（Banyuwangi）前往600公里外的日惹（Yogyakarta），即省会城市。我们从火车站坐人力车前往一家便宜的背包客旅馆。这时开始下雨了，我所说的下雨是指天空中倾盆大雨，只有在赤道地区的雨季才能体验到这种景象。

人力车夫在旅舍门口停下，我出于绅士风度，帮西尔万把背包拿到小棚子下面。我转过身去寻找自己的行李——人力车夫不见了！他只需要再开一两米，就能在雨中完全消失。座位上还放着我的背包，里面有我的证件、机票和旅行支票，以及装着我环游世界时拍摄的几百张照片的相机包和睡袋。

我站在那里，身边是一个不想和我睡在一起却想要钱继续旅行的漂亮女孩，我的靴子里有一张百元大钞——仅此而已！从慕尼黑坐飞机22个小时，正好在世界的另一端！

后来我总是记得这一刻，这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时刻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但生活当然还要继续。我们没钱再坐火车了，但可以坐巴士——或者是一路坐巴士，从一个小城镇到另一个小城镇，最后到达首都雅加达。公交车很脏，时不时会有蟑螂从地板上爬过。最糟糕的是，这些老旧的废弃公交车在中央过道两侧各有两个座位，但由于印尼人普遍身材瘦削，司机总是每排卖三张票。所以我总是要买票，这给本已捉襟见肘的旅行预算增加了额外负担。

我们终于抵达了雅加达，在建筑工人的宿舍里找到了一间便宜的房间。我去了美国大使馆，他们起初不相信我关于人力车夫的故事。据说，每天都有数十名滞留的美国人出现，他们为了钱把自己的护照卖了。但最终领事官员还是同意了，并为我签发了新的旅行证件。

但还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：移民局和航空公司。我最终找到的高级官员锯掉了入境证明，每个人在飞机上都必须填写该证明，而边境官员在护照检查时将其撕成两半。他留下一半，另一半则要放入入境者的护照中，以便在离开时出示。这样，背包客就不会在印尼超过法定的最长停留时间，从而给国家造成负担。

当然，我的出境单还留在日惹。官员叫来一名士兵，给他下达了几条指令。士兵走到出租车停靠点，上了车，我们当然也跟着上了车。他简短地给司机下达了几条指令，然后开车带我们前往城市的郊区——雅加达在当时就已经很大了——一个破旧的波纹铁皮大厅。里面堆放着成百上千的草包，看起来就像高山牧场上的草卷。只不过这些草包是由数十万张纸条组成的——边防人员保留的入境表格。

至少它们有日期，我们来回翻找了整整一个小时，才找到我入境当天的那一沓。我们拆开它们，仔细寻找，直到找到我的那张纸。然后，我们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捆好。然后，我们开车回到总部，我的士兵下车了。出租车司机抓住我，用手指比划着——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付钱手势。我向士兵示意我没有钱。他很生气，不相信一个圆眼睛的人会真的没钱。最后，他给了司机一张磨损的200卢比纸币——当时只值几美分。

唯一的问题是丢失了机票。我去了鹰航办事处，向一位穿着空姐制服的年轻漂亮女士投诉。 她说，不幸的是，与新加坡的传真连接已经中断了好几天。 所以她无法检查我的信息是否正确。 我向她描述了我的绝望处境：通往欧洲的线路也中断了，我无法从银行取钱。此时，我几乎已经花光了靴子形状的钞票。

经过多次来回奔波，那位年轻女士终于愿意为我补办一张机票——但她紧急要求我立即去新加坡的加鲁达航空公司说明情况。她哽咽着说：“否则我会失去这里的工作，而我的孩子、丈夫和父母都靠我的工资生活！”

当然，我首先去了加鲁达银行，然后去了德意志银行，那里的电传系统也不工作，所以我被推来推去，等了几天。我和西尔万问出租车司机哪里有便宜的旅馆，他咧嘴笑了。“啊——明古连街！很好！很干净！很便宜！”

所以我们最终住进了中国工人阶级区的一间廉价旅馆，那里住着许多中国散工，房间里有一张床，床垫几乎要掉到地板上。房间里有一面墙镜、一个水桶，走廊外有一个室外厕所。天花板上有一根横梁，上面白天黑夜都有老鼠在走。半夜有一只掉到了我们的床上。席尔瓦娜保持冷静，和她的训兽师一起把它赶走了。

在这个炼狱里住了三个晚上后，我们实际上已经适应得很好了，包括老鼠。我们周围有上千个食品摊，花几便士就能买到辛辣的食物。我们的旅店院子里有一个水龙头。房东是两个梳着长辫子的小中国女人，她们每天早上敲门，提前收取每晚一美元的租金。

然后，钱终于从德国寄来了：五千德国马克——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！我曾向席尔瓦娜承诺，等钱到了，我们就去一个真正高档的地方。于是我在全东南亚最负盛名的莱佛士酒店订了张桌子，然后去了机场，我把行李箱里的一身欧洲正装（我离开时在日本和香港还有几场商务约会）寄存在了行李寄存处。我和Silvaine一直穿着牛仔裤或纱笼到处走。

我们实在受不了这种高温。

回到家里，我们住在临时工宿舍里，用桶里的水互相冲澡，让我最后一次给她擦背，然后用浴巾擦干——除了性，我们几乎已经像一对老夫老妻了。

我穿上西装，打上领带，Silvaine从背包侧袋里拿出一小块丝绸，抖开后塞进衣服里——这是一件完美的“小黑裙”，没有一丝多余的设计，贴身得恰到好处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莱佛士酒店的Long Bar酒吧品尝了新加坡司令鸡尾酒，又在餐厅吃了一顿，花了400美元——是我们从日惹到新加坡的整个旅程花费的四倍。晚上结束时，我们考虑在莱佛士酒店开一间房，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相反，我们乘出租车回到明古连街，与老鼠们共度最后一夜，在床上酣然入睡——就像我们最初那样天真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给了她1000美元作为“贷款”，然后我们分道扬镳：她继续前往泰国，而我则去了机场，然后返回德国。

钓鱼爱好者在谈论一条不幸逃脱的大鱼时，有一句老话。他们称之为“漏网之鱼”。是的，这就是我可爱的席尔瓦娜——我永远无法拥有的女孩……